

走遍天西再向东 —— 追随冯其庸先生西域考察琐记

朱玉麒

玄奘之路的研究，我们至今还欠着对于这条道路的一次全程考察，而冯先生已经引领我们走过了一半。

冯 其庸先生去世的消息，是在1月22日下午由先生的女儿幽若姐告知的：“玉麒兄，您好！我父亲今天中午12:18在潞河医院平静安详仙世。”那一刻，我心里无比怅惘。

回想起10天前，还刚刚与荣新江、孟宪实二位教授去家里看望过冯先生。他比年前我们去医院看他时瘦了不少，见到我们来，很激动，一下子来了精神，说了很多话。说我们遇到了好时光，可以安心做学问，可惜他自己虽然还关注，已经没有能力从事研究了。又说起到明铁盖调查玄奘东归入境事、去罗布泊事，历历在目，甚至还记得第一次到明铁盖达坂前，我缺氧之后的狼狈状态。在更早一些时候，我和孟宪实一起去医院看望他，他也非常高兴，说到当年在西域的事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你看我走了这么多路，现在却不能走路了。”忽然便哽咽起来。

即使是那样，只要冯先生在张湾住着，我便总觉得会有那么一天，会回到1995年到2005年的那个阶段，先生的电话打过来：“小朱，你计划一下，今年我们再去一趟新疆！”于是，一个月后，我们驰骋在了龟兹盐水沟的山路上……

现在，先生离世的消息传来，我知道那个邀约同游的电话，再也无法等到。先生的西域之行，终于停止在了2005

年前往罗布泊的第十次新疆考察之后。

为冯先生守灵的晚上，看着烛光中的先生遗像，我每每恍惚起来，觉得他还没有走远，脑子里想起的，都是追随他在新疆的一些琐事：一会儿是在莎车的营房里，教我用牙刷蘸了肥皂刷衬衣的领子；一会儿拿着金庸的《书剑恩仇录》，问我“玉旺昆”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地名；一会儿又是在明铁盖前，他冻僵了的手指在艰难地打开相机后盖更换胶卷；一会儿又是回程的时候，他仰起脖子从贴身的衬衣口袋拿出钱来说：“一起来还是一起走，你还在读书，机票我来买了！”

是的，冯先生每每客气地对别人说我是他在西域的向导；实际上，在那些西域同行的岁月里，是先生的引领和熏陶，使我走上了西域研究的学术之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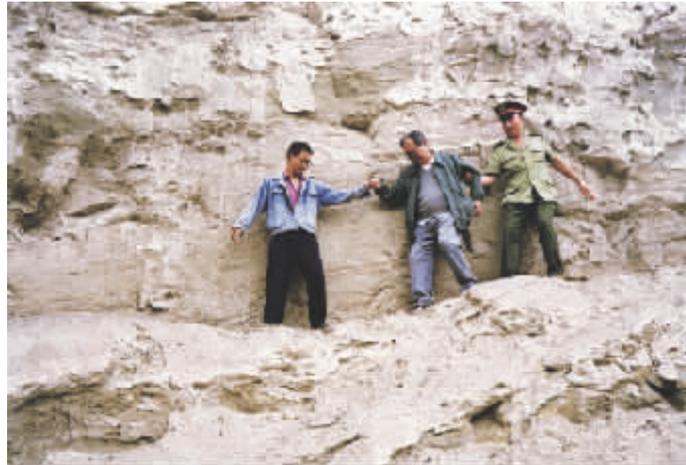
1 1986年10月4日，我第一次见到了前来新疆讲学的冯其庸先生，聆听了他在新疆师大关于《红楼梦》的讲座。今天翻出31年前的日记，看到我是这样记录了听讲后的感受：“下午冯其庸要来作学术报告，3:30便与系上的秘书打扫教室。4:00冯来，讲了三个小时，很有精神，且很认真——来过的几位内地学者，我觉得都对新疆怀有极虔诚和尊敬的感情，作一些报告

特别实在，讲心里话。冯先生是江苏人（听口音是无锡人），中国红学的巨擘，考据方面很有成就。晚上8:30在行政楼四楼仍有座谈。”

作为刚刚开始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青年教师，那个时候的我对于冯先生的了解，仅限于作为《红楼梦》研究的专家而已。听过他的讲座，我以为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。因为在那样一个交通并不方便的时代，内地学者带着对新疆的神秘向往，克服重重困难前来者，虽然不少，但也难得再度前来，更何况已经62岁年纪的冯先生呢？然而1987年的8月，冯先生却第二次前来；1991年、1993年，冯先生又第三、第四次前来。

1993年10月5日，他第一次深入南疆考察回来后，专门让陪同前往的胥惠民老师邀我到他在乌鲁木齐下榻的宾馆，与我畅谈南疆的感触，然后一起去博物馆参观。那天我的日记里写到：“冯先生很客气，聊新疆见闻，他觉得西域研究比之《红楼梦》更具有现实、历史意义。”这个振聋发聩的说法，在当时让我大为吃惊，甚至觉得可能是一种对新生事物夸大的称赞。但之后，却发现他不止一次在发言中、文章里表达了这样的见解。正是这样的认识，使他与西域结缘，于是又有了1995、1997、1998、2004、2005年一次比一次深入的考察，一直到第十次！他十次西域之行到达过的地方，超过了很多人一生都在新疆的当地人。冯先生成为了西域的“发烧友”、玄奘西域遗迹的追踪者、新时期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创者、大国学理念的倡导者——西域成为了他《红楼梦》研究之后攀登的又一座学术高峰。

与 冯先生熟悉起来，并追随他一起在新疆考察，就是在1993年他第四次西域经行之后。在这之前一年，我曾经环游塔里木，因此在冯先生前往南疆之前，新疆师大安排冯先生考察了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，我有幸陪同，在途中向他介绍了南疆喀



冯其庸去克孜尔千佛洞后山寻画家洞的途中



在明铁盖山口立碑

什、和田等地的情况。在冯先生开始关注西域以来，我可能是他认识的人中在新疆经行比较多的，因此他不耻下问，将我引为小友。因为这个机缘，1994年，当我考上研究生，重新开始北京负笈八年的学生生活时，向冯先生问学的机会就分外多地多起来。

从那以后冯先生的几次新疆之行，以及河西走廊直到额济纳的考察，我都得以受邀追随左右。之前我也在新疆工作，对于广袤的新疆的历史地理考察，虽心向往之，但从经济条件到人际关系，青年时代的我都无法实现。是因为冯先生的资助，我才得以完成憧憬很久的壮游；因为这些壮游，我也有意识读了更多有关新疆的书，从而对新疆增进了更多的认识。

2000年，我博士毕业，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，从事起西域历史文献的研究。这个转型，不能不

说是受到冯先生对西域热情的感染，以及多次西域之行给予我更多感性认识的影响。在2002年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的致谢里，我写道：“冯其庸先生多次西行探访玄奘故道，每次都特别资助我随行考察，我因此得以在十年之中走遍天山南北、黑河上下。先生的心迹，使我在进行历史文献研究的同时，不敢忘记其中应有的现实意义。”后来我做《西域水道记》与《新疆图志》的整理，在地名索引的处理时，对于同名异地、同地异名的高度警惕，无不来自跟随冯先生考察途中跋涉过的语源各异的地方的敏感。今天，当我在校勘即将出版的《新疆图志》地名索引时，看到蒲犁与疏附属下的“明铁盖达坂”时，似乎又回到了与冯先生三上帕米尔、寻找玄奘踪迹的那些时光。



冯其庸绘古龟兹国山水